刘绍宽笔下的“九一八”

杨敬秀

93年前的1931年，震惊中外的“九一八”事变发生时，刘绍宽正在上海，应黄溯初之约，校印第三辑《敬乡楼丛书》。第二天，刘绍宽就在日记中写道：“日本昨夜在奉天开战，今晨通易电话，日本报已有外号。”

一、弹雨硝烟

刘绍宽不仅在日记中作了记载，还作二首七律《九月十八日》。

——弹雨硝烟震地来，不殊朽拉与枯摧。9月20日，《刘绍宽日记》载“九一八”事变发生经过：“阅报，日本籍中村大尉失踪事件，对我国实施威吓，藉图抵制鲜案、万案及各悬案之交涉，达到进占满蒙之目的。十八夜十时，日本驻辽军士，捏称我军启衅，先炸皇姑屯车站，进攻北大营。十九日晨六时，竟进占沈阳，络续进兵，将宽城子、牛庄、安东、营口、河北、抚顺相继占据，沿途枪杀人民，劫掠甚惨，辽省等于全失。”弹雨硝烟，形容炮火猛烈，战况激烈。日本军队所到之处，烧杀掳掠，无恶不作，其势汹汹，简直可以说是摧枯拉朽了。

——颇闻经武雄全国，何意崇朝付劫灰？听说国民党整军经武，称雄全国，为何竟在一朝一夕间东北一地化为灰烬？《刘绍宽日记》记载：“日本侵入沈阳后，续向各地袭击，南起安东，北达辽源，东抵长春，西迄沟帮子，东省各要地全失。日军尚分向青岛、塘沽、葫芦岛登陆。大沽口各国兵舰开到。与鲜朝接壤之我国吉省延吉、敦化、珲春、江清、和龙五县均失守。吉林省垣失守。日海军在葫芦岛破坏我自筑北方大港。张学良宅被焚。”

——境入无人甘避敌，策终束手信庸才。日军如入无人之境，国民党军队束手无策，节节败退，甘心将大好河山拱手让给日寇。22日，《刘绍宽日记》记载：“日本二十晚占吉林省城长春，火势仍炽。”28日，刘绍宽写道：军阀互相观望，互相顾忌，莫肯相先。国民愤激，挑动衅端，中央代为惩办祸首，以谢日人。29日，“阅报，上海各学校往南京请愿讨日，中央通告学生书，大致谓少安毋躁而已。”刘绍宽发出责问：“奉事发生十日矣，而中央不闻发一策，何以系民望乎？”国民党的不作为和腐败，由此可见一斑。

——膏腴百万兼圻拥，赀寇兵粮剧可哀。所谓兼圻，即清代总督多管辖两省或三省。东北三省，山环水绕，沃野千里，如今被日本所占领，为日本军队提供兵粮，实在是可悲可叹。10月2日《刘绍宽日记》载：“日政府回训芳泽大使，大意谓：日军进踞沈阳、吉林城内等条约规定以外之各地，系战略占领，俟治安恢复即当撤退。日本政府并无以日军撤退占据地为解决满蒙悬案之交涉条件之意。日军占领东省后，运动东北四省及蒙古脱离中国关系，建设满蒙独立国，以袁金铠所组织之维持会为中心，协议东省新政权方针：一、新政权之基础，置于东北四省全体民众之上。二、新政权之本体，由合于民意之人物组织，及决定其政体。三、维持人物与政体问题，由公举之委员议决之。四、该地域限于东北四省。”

10月4日，刘绍宽与友人一同往游法公园。上一次游玩是在8月23日，“九一八”事变之前，那时天气尚热，而这次来则是秋风萧瑟，他颇有感怀，况且东北三省遭到摧残，在这里又见到外国人来来往往，熙熙攘攘，更觉无限凄凉。

二、旧史残棋

——吴王争霸会黄池，于越兴师国遽夷。黄池，地名，位今河南省封丘县西南。春秋时吴王夫差盟诸侯于此。《史记》卷三十一《吴太伯世家》载：“（吴王夫差）十四年春，吴王北会诸侯于黄池，欲霸中国以全周室。”正当吴王夫差争霸中原之际，越王勾践出兵吴国，并最终灭了吴国。

——不谓千年翻旧史，依然一局踵残棋。历史总是惊人相似。两千年前吴王为争霸会于黄池，不会料到有越国的后患。而蒋介石发动与阎锡山、冯玉祥和李宗仁之间的军阀战争，史称中原大战，他们是否在意日本会发动侵华战争？然而，千年历史一再重演。

实际上，内战一直没有停止过。就在“九一八”事变发生的当天，《刘绍宽日记》载，“粤桂军侵湘，忽进勿退，长沙戒严。粤方以东江吃紧，变更入湘计划，以桂军图湘，粤军调回，李扬敬已退守郴州，广州自十六日起戒严。”19日，“粤、桂军在湘确已退出，或云内部不和。”直到22日，“中央电粤方，告国难，息意气。粤方复电赞成团结一致对外。”

——早知塞外长蛇在，何事关中逐鹿为？塞外，长城以北。长蛇，贪暴者。早知道日寇要入侵中华，为什么还要逐鹿中原，发动战争，以至于民不聊生？通过中原大战，蒋介石取得了战争的胜利，暂时统一了国民党各军事集团。

10月2日，《刘绍宽日记》载：报论，“北取北满，南取关内”，早见之《田中奏章》，虽未行于彼有生之日，而今日所搬演者，殆无不依此《奏章》为曲本矣。《田中奏章》，是指1927年6月，日本田中义一政府给天皇的奏折。内称“欲征服中国，必先征服满蒙；欲征服世界，必先征服中国”。可见日本侵华野心由来已久。

——卅载经营隳一旦，景升豚犬又奚辞！景升豚犬，景升，东汉末年荆州牧刘表字。刘表与其子琦琮都是碌碌无为之辈。故世人用“景升豚犬”谦称自己的子女。刘绍宽义正词严地指出：中华民国三十年以来所积累的成果，如今毁于一旦，而国民党则难辞其咎。

三、兄弟阋墙

除《九月十八日》两首，当年刘绍宽又作一首《重有感》。

——百万嗷鸿未息哀，虫沙浩劫又纷来。由于军阀内战而导致百万难民流离失所、无家可归，而现在又有外部浩劫纷至沓来，致使无辜黎民百姓死于战乱，哀鸿遍野。

——正当同室缨冠救，何待连盟槃敦开？在此时，应该团结一切力量，拯救百姓于水火之中。可是，政府却在消极等待，把停战的希望寄托于国联的调停。9月24日，《刘绍宽日记》载：“中国公使施肇基诉之万国联会，该会令中日两各撤兵，调查真相。”万国联会，即国际联盟，也叫国际联合会，简称国联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国际组织。结果怎么样呢？28日，刘绍宽写道：“日本侵占奉吉，中央听命国联，被却，中日直接交涉，此本豫料事。”因此激起民愤。

——事异黄池争长日，世须微管定倾才。如今的中日战争，不同于吴国中原争霸，需要管仲那样能扭转大局、将倾覆之国转为稳定的人才。然而，实际情况将如何？刘绍宽记载了几条大胆的预测：一、军阀互相观望，互相顾忌，莫肯相先。二、交涉失败，土地不能复，所丧失者皆不赔偿。一切悬案，日得圆满结果。三、各国利益均沾，环视而起，兆成共管或瓜分之局。四、国民愤激，挑动衅端，中央代为惩办祸首，以谢日人。五、国民忿倒政府。

——阋墙自侮谁能御，愁见姑苏鹿上台。“兄弟阋于墙，外御其侮。”姑苏台，在姑苏山上，相传为吴王夫差所筑。兄弟之间虽然在家里吵闹，但一旦遇有外侮，却能同心同德，共同抵御。否则，将会导致丧权辱国，到那时，只能任凭外敌侮辱了。

兄弟果能外御其侮吗？多年后，1936年6月22日，刘绍宽写道：“又言中央购兵舰于英国，须千万，无回扣，议不谐。购之荷兰，亦然。乃转购之日本，仅五百万，有回扣，乃定购之。初试开炮，船身震动却退，盖日本以极劣之舰改饰之以售中国耳。当事如此，如何能御外侮？”这是刘绍宽的一大质疑，也表明了他对国事的关注和关心。

一生执教 一家之作

—读陈功甫《国民教育实施问题的商榷》一文

陈墨

陈功甫先生是我伯祖，可能因有这层关系，对于他生前著作与生平事迹，我都比较关注。从这几年来对他史料收集来看，在民国时期的老平阳（含今苍南县、平阳县、龙港市），他是唯一一位国立北京大学史学系毕业生，亦是唯一一位国立中山大学史学系教授，还是唯一一位国家层面的近代历史学家。他一生从事教育，自小学至大学各阶段均有任教过，还曾任过广州市立第二中学校长，广州市教育局督学，《学生杂志》主编等等。他把自己并不长的生命，奉献给了中国教育事业，是教育界宿老级人物。他在史学领域著作较多，但在教育学领域几乎没有著作，这不能不说是种遗憾甚至有些不正常。

苍南陈彼得先生发来先生于民国29年（1940年），在平阳县《新县政》第一卷第二期“教育专刊”发表的《国民教育实施问题的商榷》一文，我若获至宝。有了此文，似乎多少可以填补了他在教育学方面没有作品的空白，也能从文中体会到他对教育方面的见解。通过细读此文，启发颇多，现略谈如下。

先生发表此文，正处国难当头，为避战乱而身居家乡。他在文章开头，就直截了当地把当年所存在的教育问题毫不避讳地提出来：“没有能力或机会进学校—失学；有机会或能力进了学校，并且在学校毕业出来的，又不适于社会之用—失业；这是我国目前教育上急待解决的两个大问题。”先生认为，此两大问题的出现与解决，与如何推进实施国民教育有着直接关系，故他着重从以下几方面，作为论述重点来阐述。

“量”与“质”

先生认为推进国民教育，要从量与质两方面入手，齐抓共管，双管齐下，方能出真效。他先从国家教育部颁《国民教育实施纲领的总则》中分析道：“细审其内容，具见我国教育当局，对于学校教育的症结，量的方面，已有相当具体的解决，设能推行顺遂……惟对于质的方面，仍不免有空泛挂漏之感。”认为部颁上述纲领，如加强实施，在量方面也许有所改观或能达到目标，但同时认为要关注弱势群体，让教育资源实现公平：“在救济失学这方面，除了增加学校数量之外，我们要注意到‘平民化’三个字，经济上能力强大的和能力薄弱的，要在教育上享有均等的机会。”最让他担心的是国民教育在质方面是否有成效？他认为上述纲领对质方面，还是很空洞很抽象，没有具体可操作性。对于这方面的担忧，他在文中写道：“‘民族意识’‘国家观念’‘国民道德之培养’‘身心健康之训练’以及‘养成自立自治之能力’‘授以生活必需之知识技能’等，均比较对于量的方面之统计，抽象得多。究竟怎样才能养成？怎样才算训练和教授，并没有切实的指示……”在他看来，新颁布的纲领总则，并没有解决教育“质”的问题，这恰恰是我国教育难以进步的主因。

面对部颁纲领总则，立足当年教育现状，先生从教育历史等角度，深度分析为何在质的方面，难有成效之根结所在：“从教育历史来看，我国的教育非但制度不对，而且全般的方针也不对”。在他看来学校教育存在几大严重问题：一是教育只是抽象的知识灌注，未及实际能力和行为习惯的养成；二是一般的教师们，简直可说是“有教而无育”，多用“抽象智识”来做独一无二的贩卖品，而所贩卖的智识，又与学生实际生活需要，绝不发生关系；三是学生们可说是“有学而无做”。

“教与育”和“学与做”

先生认为“有教而无育”“有学而无做”的教育，都呈物理学上所谓“离心力”的趋势，还要求效果的推进，这真是尤乎其难，简直是痴心妄想，必须要解决“分离状态”。

先生认为：“我国教育上普遍的弊病，就是在“教”与“育”分离，学生们普遍的弊病，是在“学”与“做”分离，坐这原因，就酿成一种“知而不行”及“能言而不能行”的习气”。由此在社会上普遍形成了“手脑分离”的现状，出现了“用脑”与“用手”两级：前级的普通称作“智识阶级”……后级的普通称作“劳动阶级”……他认为出现或造成“智识阶级”与“劳动阶级”两级分离现象，是有一定历史了，可以说是几千年来积沉下来的顽症，必须要有所改变，非下猛药不可，要走“手脑合作”和“生计教育”方面的改革。

为此，他在文中提出了具体改革方案，那就是“工学双方并进制”和“教作先后交替制”。先生认为只有实施上述”两制”，才能彻底把学校教育与工作有机联系在一起，才是践行王阳明“知行合一”的教育理念，才不会盲目学习，浪费资源，真正做到学以致用，因材施教，亦是最能反映学生真正的兴趣所在。

“工学并进”与“教作交替”

先生在文中详细介绍了何谓“工学双方并进制”和“教作先后交替制”：“工学双方并进制”，就是把学问和工作联络一起，学校的课程，分做两半，一半是上课学习，一半是按时作工，并且所做的工作，不单是一种实习，却是实在谋生……“教作先后交替制”，就是把教育的时期划开，读了一期书，跟着就做了一期工，看其成效怎样？和发生什么需要？兴趣及能力在哪里？才进高一级去读书，使学校教育和个人能力，无丝毫浪费之感。他认为学校方面要根据情况，建立农场、商店、工厂等，供学生做工之用。他归纳这样做有这么几个好处：一是真正实现知识价值，真正实现学以致用，让知识到实践中再巩固，再提炼；二是不浪费国家与个人资源，是一种最经济的方法；三是在实践中考验一个学生，而学生也能从实践中了解自己的真正兴趣爱好，以此作为是否升级的重要考量，真正做到因材施教。

先生在文尾总结道：“照这样具体办法的结论，我们要改进学校教育，就要随时随地，参酌这样方针实施，断不能仍照从前教育家们“换汤不换药”的改革方案，照样“一五一什”的旧调重弹，整天在那里提倡改革，筹划新制，而实际上学校教育的成绩，仍毫无把握，致蹈了数十年来改进教育徒劳无功之覆辙。”功甫先生作为几十年从事教育者，其实践经验非一般人可比，而他此文完全基于当年教育实际出发，好多观点至今还无法真正落地，还是很值得教育界学习与深思，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。